

1987年3月24-25日

筆名 何春蕤

題目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致胡同 (上) (一)

原題

中國時報 人間 版

雜誌 卷 期 號 頁

重刊 1 2 3 修刪 小 大

收錄 書名 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台灣篇) 出版社 谷風

日期 1988年11月 日 頁數 77-94

備註

前言

1986年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在美國修博士學位，之前在著名女性主義者蘇珊·顧芭(Susan Gubar)門下受教的經驗，使我觀察到許多在女性主義學術化過程中浮現的、令婦運人士憂心的問題，包括菁英化、去運動化、排他化等等；換言之，當女性學術慶幸本身成功的逐步正當化、專業化的同時，美國婦運卻在保守的反挫力量中艱苦奮戰，這種並列是很諷刺的。沒有多久之後，我就注意到台灣的外文學界(目前活躍參與婦女運動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當時都尚未回台或任教)開始熱衷引介學術化了的女性主義批評，而且是以與運動沒有明確連結的方式來推廣，這個發展使我頗為不安，因此在假期間抽空寫了這篇文章，在文中明白的指出，與社會現實和婦女運動隔絕的女性主義批評只會走向學術的死胡同，文中暗示研究女性主義批評的人需要透過歷史的分析來認識本身學術發展與運動之間的緊密關係。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在1994年我提出女性情慾解放理論之後，居然被用來檢驗我的女性主義立場。抹黑我的人說這篇文章顯示我反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就是我反對女性主義——因此也就證明了我不是女性主義者，順便證明了我的女性情慾解放理論不是女性主義的。不過，像這樣的曲解在西方女性主義陣營中也屢見不鮮，八零年代性辯論(sex debate)時，一些與保守右派結合起來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也是這麼排擠那些開拓女性情慾空間的性激進派(sex radicals)女性主義者，說後者的女性情慾立場不是女性主義的，因此後者不是女性主義者云云。現在回頭看來，這些排擠的言論當然已成為歷史的笑話。在1996年的此刻重印這篇文章，我也考慮過是否重新用理論的語言來說明文中所蘊含對本質主義、對運動實踐、對結盟對象的說法，不過，或許我的其他出版文字已經足夠顯示我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此刻，就讓當年為報紙寫的半通俗文字呈現它自己吧。

1987.3.24

女性主義文藝批評的死亡

何春蕪

自從去年三月中外文學推出女性主義文藝批評(以下簡稱「女性文批」)的專號以來,探討女性文批的各種文章湧入了市場,各方的反應也陸續在雜誌及報紙副刊的專欄中出現,一時間,女性文批似乎成了繼「解構批評」之後,目前台灣最新、最時髦、但不一定最受歡迎的文學理論。

巧的是,這些引介或討論女性文批的文章幾乎都用類似的口氣來說明女性文批的重要性:「女性主義文藝批評自一九七〇年崛起後,影響廣大而且有力,目前確已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之氣候。可惜的是,我還沒有看到有文章討論何以女性文批能在短短十年間形成氣候。」

引介性文章是台灣知識界最常見的文章,這種文章在知識的初步吸收過程中是絕對必要的。但是,一篇引介性的文章不應單單介紹一個思潮的內容,而且應該討論到那個思潮在當前歷史時空條件下產生並受人重視,更進一步還要分析那個思潮與其社會實踐(即「應用」)有何關係。否則,讀者接受的只是真空包裝分解濃縮過的理論大要,是個只有骨幹軀殼而沒有歷史來由的抽象知識,這樣一來,引介的文章反而會造成作者所不願見到的效果,即:一般讀者雖能說出某某說的大意,却不知其然(皮毛的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這樣的結果就是引介進來的理論自己發展自己的,也因此很難自己發展自己的人文社會理論。這種現象在「中心」邊陲國家的學術分工關係中非常普遍。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想把各方學者已經引介過的美國女性主義文藝批評重新放回它的歷史時空和客觀環境中,也只有這樣一個廣大的背景中,我們才可以大致了解它成形的條件、發展的近況、及未來的展望,也才得以間接地分析其學說之內容及演變,以及它「移植」台灣的條件。

在沒有進入正題之前,我們得先粗略地談一下婦解運動及女性文批之關係。美國的婦解運動最早是爭取婦女參與廢奴運動的權利,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又進一步為爭取普選權而奮鬥,這每一階段的努力都有它特殊的歷史條件,在此略過不提。到了六〇年代,情形又不同了。在六〇年代,婦女面臨家庭與事業的兩難選擇,生產機械化與教育程度的普及,給予婦女某種程度的就業及發展自我的自由,但也製造了隨之而來的嚴重問題:一方面由於生活費用提高,婦女必須為家庭的需要而外出工作,一方面卻又必須同時繼續擔負家庭中各樣家務,「女強人」生活中的壓力與尖銳的矛盾成為當時美國的嚴重社會問題。隨着人權運動的發展及黑人社會地位不平等問題的提出,女性也開始意識到自身身為「二等公民」,於是,各地紛紛成立了婦女組織,更於一九六六年由「女性神話」一書之作者貝蒂·弗里丹為首,成立「全國婦女會」來推動婦運。她們所提出的問題——小自托兒中心,大至國家政策,具體到同工同酬,抽象到女性意識——反映了美國婦女切實的事項,也暴露出美國社會本身的一些基本問題。

由六、七十年代婦運的主體成員及關心的事項來看,美國婦運主要是以中產階級白人婦女為中心,這個基本性質對美國婦運(甚至女性文批)日後的发展方向有影響。一個社會運動不可能只是行動,它必須有團結行動、集中意志並為行動辯護的理論意識,因此它必然要在文化思想界得到反應。自六十年代的婦運興起後,美國的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文學、人類學、神學等等學科中都開始有女性主義角度的理論,表達並反映了婦女運動的意識。在文學界,女性文批就是對婦解運動的迴響。

女性文批作為婦運在文學理論領域中的迴響,自然也反映了婦運所關切的類似問題。大致上來說,它所探索的問題領域,由文學作品中的婦女形象,婦女在歷史各階段中的寫作及閱讀活動,婦女文學傳統的建立,到婦女文學語言的運用及特質,無一不在探索婦女所受的壓迫如何刻劃在文學作品中,從而期望因意識的提昇而促進婦女爭取權益,反抗壓迫。在此要說明的是,女性文批並不是一個宗旨明確、目標統一的組織,也因此,從事此種批評者因其不同的假設、原則與價值觀,往往擇取不同的角度、手段及最終目的。本文中所述論的女性文批是指此中的主流派,重要人物有伊蓮·蕭瓦特、安奈特·克拉德尼、仙杜拉·基爾伯特、蘇珊·顧芭等人。

《展聯品作家作性女》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的經濟不景氣製造了大批失業人口,工業的精密化與

人口的增加,於是在婦運高潮期間,女性教授逐年增加(雖然占教職總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這個就業的機會也鼓勵了更多女學生尋求更高的學位,以補充市場的需要。這些制度上的誘因實在是女性文批及其他婦女研究科目得以在學院內生根的基本原因之一。

隨著婦運的發展,婦女意識的普遍覺醒不但在追求平等的政治、法律、經濟權利上,同時也改變了女性對周遭世界的認知過程。文學系中的女性在各種民權、婦解、反戰運動的衝激下,不能再滿足於出世而旁觀的「新批評」方式來分析文學,而要求了解文學與社會之關係;女性意識抬頭後,更觀察到大批男作家作品中描繪的平面或刻板女性形象不是慈母聖女,便是潑婦淫娃,與自身的經驗有極大差距,可是在教室中對這一偏見提出質疑,受婦解影響的女性學生於是以身「經驗」掛帥,肯定本身感受的真實性與有效性,向男性沙文主義的作品提出挑戰,抗議男作家一貫扭曲婦女形象,也抗議這種扭曲而只談作品內在的象徵與主題在形式上的一致性。

女性文批不但發表的論文聲勢驚人,壓過男性,連這方面的課也深受學生歡迎,或更當然有其特殊原因。前面提過文學系的女生是大多數,由於女生本身的「先天優勢」——女性主義文批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再加上女性主義已成流行的題目,要趕時髦,並顯示自己解放了的新女性,就必須知道女性文批在搞些什麼,因此女學生爭相選修婦女研究及女性文批的課,造成人滿為患,連研究所的討論課

位逐漸穩固,名聲也已建立,為了表現學術多元及開放的規定,更不願失去自身多元主義的開明形象,多半讓出一些空位給女學生發表論文,女性文批便在這次縫中逐漸壯大。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女性文批在七十年代興起當然有其歷史因素。第一個客觀條件便是愈來愈多女性進入高等學府。五十年代美國



◎何春蕤

女性主義 文學批評 的死胡同

會逐漸被撤回，這說明以美國婦運過去爭取到等權利正逐一倒退的原限於篇幅，我不能詳論婦運衰退的種種事實，在另一文中再談。

美國的女權運動普遍受打擊，但女性文批却院內蓬勃發展（至少未有此現象），這不是矛盾一點也不，因為女性已與實際女權運動脫節從事女性文批的女學女權運動中的精英份子（教育程度來看），她們在學院之內，進行理論研討她們學術上的成就與來之不易，故多珍惜不願大得罪男性同儕的型態是這樣的：一、文批者剛出道時用十個的語言及研究來進行在七〇年代奠下名聲，一旦在學院內找到工作，為謀求終身職，往往收斂鋒芒，在規矩矩，噤若寒蟬，後進女學生或謀職的出頭說話，而只告訴「我的工作來之不易，崗位上慢慢奮鬥，總學院外抗議示威來得預，主要著眼於加強國家本身的統治合法性，也為了保持市場需求不斷（因失業業者或窮人都可因補貼而有錢可花），有防止經濟崩潰的作用。但是當美國經濟日漸走下坡時，補貼對市場的干預就變成了障礙，生產力下降、投資減少、利潤率下降等現象都被說成是補貼政策帶來的惡果，因而讓市場自由運作的呼聲高漲，追求效率的分配價值觀與政策開始抬頭，而在前一時期中人們所爭取到的平等權利與福利就觀。這兩個價值觀雖然互相衝突，但在實際上却形成互補的關係，有用來穩定市場結構的功能。在美國經濟的巔峯時期，追求平等的價值觀大大抬頭，並落實為補貼政策（福利、救濟等都是補貼）。這種補貼政策或平等政策是國家對市場機能的干預，主要著眼於加強國家本

如果說女性文批逐步解除武裝，由集體的運動轉為個人事業的發展，那麼，那個更廣大更普及的美國婦解運動又如何呢？在這裡，我們必須審視一下美國婦解運動最近二十年來的發展及其歷史因素。

自六十年代以後，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領導主力逐漸落入主張在現存結構內改良的人手中，因此婦解運動就變成極為狹隘的女權運動，所爭取的目標也就由建制解體、婦女解放轉為爭取「平等權利」，美國婦運從此步上衰退失敗的命運。

為什麼會衰退失敗呢？美國市場競爭結構中存在著兩種分配社會報酬的價值觀，一個是追求效率的價值觀，另一個是追求平等的價值

這樣的一個轉變正女性文批者缺乏團隊遠見，只考慮到個人未考慮到女性全體作團體所需要的互助與這種個人主義也透露文批者本身真正所認會團體，不是大多數結構中處於劣勢的女，而是學院中的精英她們實在不配算作女者。

◎美國的女性文批

1987.3.25

中國時報〈人間〉

選擇固然給她們帶來某一程度的事業成功（不管多麼有限），她們所從事的文學批評也被同儕視為具有一定的學術理論地位，但是她們與婦解整個脫節，只追求符號層面的抽象分析，而不打擊性別壓迫，也帶來另一種困擾：男性的競爭。蕭瓦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最明顯地表達了這種威脅的壓力；女性主義雖是女性為自身權益所作的自發式奮鬥，但蕭瓦特指出，目下愈來愈多男性介入女性文批（如美國目下最紅的文學理論家伊戈頓與柯勒等），似乎有一讓大哥

哥來教妳們如何做好女性文批的意味，有鑒於男性學者之經驗、思考、及訓練向來超過女性一等，蕭瓦特於是憂心忡忡地警告女性文批者留心男性接手她們的行業。

蕭瓦特的反應很值得分析。如果女性文批真的是以爲女性謀福利求解放爲目標，則愈多人加入此一努力就應該愈好，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爲女性的權利而戰的皆可視爲同袍戰友，那就就談不上威脅了。問題就在於，蕭瓦特似乎認爲只有女性才可從事女性文批，這裡的假設是：女性的經驗是無法溝通給男性的，因此只有女性才能爲女性而戰，只有女性才有資格懂女性主義。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來，蕭瓦特擔心的只是女性終究不如男性，女性文批因此可能會被男性據爲己有。這種心理上充分反映出女性文批者雖口頭上喊「男人能，我們更能」，但骨子裡根本不夠自信，也反映出女性文批已成了另一個學術遊戲，任何人皆

可插手，再也沒有任何政治鬥爭性。蕭瓦特的恐懼只再一次顯示出女性文批者的真正最終目標不是爲全體女性謀福，而只是推進個人的成就與利益，打著女性主義的旗號發展自我的事業而已。

此外，由於爲了排斥男人加入女性文批，爲了防止自己已被批判力較強的男性所批評，女性文批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著意發展出「女性經驗獨特」、「獨特女性語言」、「男人絕無法窺其堂奧」之類的理論，往往這類理論走向玄而又玄的境界，一點不能連繫實際。孤立女性經驗，就是在政治上孤立，這是政治運動的自殺。婦解若要有成就就必須一開大門，走大路，團結社會上其他有被壓迫經驗的團體才行。女性文批的閉關自守，說穿了無他，不過是爲了保住飯碗，想長期壟斷女性文批而已。

婦解運動是個群眾運動，女性主義是女性群體覺醒到自身所受政經、法律、文化、語言、意識等方面的歧視與壓迫後產生的集體意識，有組織的反抗性行動，它既不是個人存在主義式地認定自身價值的單一行為，也不是個人孤身反抗壓迫的個別舉動。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女性文批在抽象層面所做的個人努力，實在距婦解的理想甚遠。

女性文批的脫離現實除了和其個人主義與認同對象有關以外，也和其研究目標及方法學的假設有關係。許多女性文批者是在新批評的調教

下出師的（新批評在理論界的失勢是六十年代的事，但是教學方法直到今日仍不全脫新批評的框架，這主要是由於師資的新陳代謝及理論在教學上發展運用，和理論界的步調總相差數十年的緣故，因而女性文批者仍是在新批評的奶水中調教出來的），在新批評的意識影響下，對文學仍有一定程度的崇拜，看不出文學在社會結構中的邊陲性角色；後來她們因女性意識及意理分析的指點，雖然明白了文學所扮演的意理功能，却仍習慣於使用「文學」觀點及方法來分析文學。也就是說，她們仍然走某一個程度的形式主義路線，在文學作品本身的字面、意象、與主題之間的內在關係中找尋壓迫的痕跡，而很少實地探索文學作爲一個社會建構是如何進行其意理功能的，基爾伯特與顧芭所寫的「閣樓瘋婦」式的分析便是此中的典型。

這種狹隘的研究方法固然和學術精密分工造成的短線觀點有關，但也反映出女性文批沒有充分和其他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如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史學等方面的女性主義研究）聯手作戰，彼此聲援，以「歷史—社會」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要想分析文學在性別壓迫的社會中所扮演的意理功能，而不去了解那社會及其各方面運作的機制，或不研究社會結構與它所產生的文學之間有何回饋及互補功能，是絕對徒勞無功的。這也就是女性文批主流目前走進的死胡同了。

在主流以外，美國也有不少女性文批者至今仍與婦解運動保持緊密關聯，而且她們的研究也是以婦解運動的整體目標爲大前提與指標，可惜她們多半不受中產的主流女性文批者所容納，也在學院內及出版上遭受各種挫折與阻撓。關鍵就在於：這些非主流女性文批者（如黎安·羅賓遜、羅莎琳·考渥德、萊迪絲·勞德、牛頓及研究黑人女性文批的邦妮·辛摩曼等）要求徹底的改變社會結構以消除性別及種族歧視和壓迫，她們認爲根本之道是必須取消男人宰制女人的建制，即父權家庭及一切支持父權家庭的建制；而主流女性文批者只希望寫些不關痛癢的理論文字，不但於建制無損，且可促進建制的開明容忍形象吧！

看清了美國女性文批的蓬勃現象的真正內涵，我想我們可以來看看女性文批在台灣有沒有橫的移植的條件。如果說在婦解運動頗爲先進的國家中，女性文批也只落得如今的地步，我們可以想見，在沒有什麼婦解運動的台灣，它會如何地與生活現實隔絕了。

當然，如果我們只是要趕時髦，引進一個新的抽象理論而不管它的隱涵價值與假設，也不管它的歷史時空意義與功能，那麼我們當然可以爲女性文批大張旗鼓，學學它的骨架，這種完全沒有婦解運動的女性文批可以在學院的真空環境中學生的。就女性主義的立場來說，有沒有這個女性文批在學院中，不是個根本問題。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發展婦解運動的條件。

黛博拉·克拉克道爾和研究的
女性主義文批的